



林政安/攝

演講者簡介

柯春德博士

(Dr. Theodore Kaltsounis)

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曾任小學教師、校長、華盛頓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全美國社會科教學學會會長，現為華盛頓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柯博士學經歷豐富，為美國知名學者暨社會科課程設計及教師訓練專家。

民主與教育

談公民民主教育如何落實於社會科教科書

演講人：柯春德博士
翻譯：曹定人博士
紀錄：范伯余、吳茵茵

原來在我的演講稿中，我要談的是公民教育及其在社會教育上的重要性。但是在看了多媒體簡介之後，我現在了解到貴單位實際從事的工作，因此我想演講主題要從各位的工作當中直接切入。因為我是美國公民教育教材的作者，所以對於公民教育教科書在美國如何運作的過程相當熟悉。在這裡我可以將過去數十年美國公民教育的教科書到底在談些什麼，中間

有些什麼改變告訴大家；讓各位分享我的經驗。各位可能知道，在美國，教育是完全分化的，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有一個教育部，但是我們不太管它在做什麼。教育部的責任是蒐集資料、分配經費，可是無法指揮我們該做什麼事；教育決策的權力是在地區、在州的層次，州與地區會提供一些方向的指引，但也沒有什麼權力。在這樣的情形下，教科書扮演怎樣的角

色？在美國，教科書是由一般民營公司出版，雖然競爭非常激烈，也沒有國定的課程標準，可是因為出版商及很多不同系列的教材之間有很多的交集，所以，藉著這種奇妙的過程，使我們即使在沒有課程標準的情形下，也好像逐漸有一個國家的課程標準，這樣的一個過程對臺灣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美國有一個組織稱為全國社會科

教學學會，這是一個自發性的組織，參加的人大概都是像我這樣致力於推展美國社會教育的學者專家，我並不確定在美國教社會科學的人有多少，但每年繳納會費的會員至少有二萬至二萬五千人。這個學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在每年召開一個全國社會教育會議。在此會議當中有二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提出並討論有關社會教育的重要議題，由在大學裡教授社會教育或是實際在中小學從事社會教育的人來共同討論並決定要提出那些報告，政府官員和這些議題完全沒有任何關係。這個會議當中另一個重要事項是舉行展覽，由全國各地的出版商及有關單位在會場陳列社會教學的出版品，包括書籍、錄音帶、錄影帶、各式各樣的教具等等。這些出版商帶來的不只是教材、教具的展示，他們把編輯委員也帶來，而且出版商與編者也參與會議中每一組的討論。如此他們便能知道全國討論的方向、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此外，他們也來觀察哪些人在會議中有指引主導的功能，假如有出版商想推出一套社會教學的教材，就會從這些在會議中具有指引主導功能的人士中邀請大約十二位來討論整套教材，再從其中挑選作者。在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社會教育的教材之時，使之思考成型的力量有三：代表

學術研究的作者、接收客戶訊息的行銷部門以及編輯者。而所謂的行銷部門其實就是在學校教書的老師。從事學術研究的作者常常與學校老師之間在認知上會有差距，因為從事學術研究的作者代表的是學術標準，最前衛的東西，學校老師代表的是實務上的境界，實務與尖端之間總是會有差距。所以在這二者之間就會有第三種力量——編輯者——的出現。編輯者扮演著教授學者與實際在學校教書的老師間橋樑的角色。這三種人聚在一起，首先會產生教材的基本架構，也就是說在此一系列裡要討論哪些東西，單元如何劃分等等。在討論的過程中，他們常常會去尋找資料，尤其是各州對教材是否有指示或指引。有些較大的州，如加州、紐約州等，對於教材各有一套指示的原則。如果這套教材要在這些州銷售的話，一定要考慮這些指導原則，但這些指導原則和全國社會教育會議中所討論的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過程，雖然我們沒有一套正式的國家標準，實際上也產生了像國家標準的原則。

在五〇年代末期，社會教育的教科書都是敘述性的，例如選一個州或國家，介紹疆界、人口、氣候等等，這種作法稱為傳統式教材。一九五七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在技術、科技上領先美國，使美國深感震驚憤怒。政府便責怪學校，因為學校教育的不成功，才使得國家在美蘇競爭上吃了敗仗。所以從那時起便開始大力強調實用性科技，社會教學也開始跟隨這個方向。到六〇年代初期時，美國發生了民權運動，國會認為美國的社會生病了，而轉向學校尋求協助，並撥下巨款讓學校研究發展，以便糾正治癒社會的病態。當時，我只是大學裡一個年輕的助理教授，有這麼多錢還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們便模仿許多科學家所做的，試著把硬梆梆的知識灌入社會教育中，希望把學生變成社會科學家。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美國的情形，跟臺灣現在的課程制度有點像。此時所強調的是讓學生學習很多知識，而大學教授也因這些學生較以往的學生擁有更豐富的知識而欣喜。但是，好景不常，到了六〇年代末期，社會上便怨聲四起。因為雖然進大學的人具有豐富的知識，但是有百分之七十不唸大學的人，進到社會上便有問題。這百分之七十的人需要的是能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的技術。所以，六〇年代末期、七〇年代初期全國社會教育會議當中討論的常常是解決問題的技術。在這裡，我特別要強調，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如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處理問題是

非常重要的社會技巧 (social skills, 泛指與人交往、相處的能力與技巧)，而我們在這方面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在教導解決問題的技巧方面走得太遠了。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到三代教科書：第一代是敘述性的傳統型教科書，第二代是觀念發展型的教科書，第三代教科書著重於研究社會事件的產生及問題的解決。第三代教科書教出來的學生所面臨的問題是，他們曉得如何解決問題，卻缺乏基礎知識；教學所得的產品是年輕、有能力，卻是無知的。對於這樣的情形，右派人士抱怨學生只會研究問題，對社會只有負面看法，而其實社會仍有其積極光明面，學生卻沒有學到。另外，在七〇年代後期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們教科書的內容變成不只強調事件與解決問題，也強調方法的應用。出版商提出的教材不只是書本，還包括其他很多的可用資源，老師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篩選整理，然後提出教學計畫，這對許多老師而言是很困難的工作。因此有些老師索性不教社會科學。我們這套教科書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能幫助老師在內容與過程方面達成均衡的發展，它不只包含基本知識，也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每一年級有一本教科書，並且藉由教師手冊，把七〇年代後期發展出來的解

決問題的技巧帶進教材中。從教學觀點來看，七〇年代後期發展出來的教科書其實是很好的，但是因為老師有抗拒心理，所以現在我們將當時的高標準降低，讓老師能夠使用這套教材，結果顯然我們成功了，這種均衡的方法也運用到新教科書的修訂過程。

在美國，有太多人將民主視為理所當然（譯按：因此就沒有人來思考，乃更無人教授民主意識如何孕育，民主技能如何培養）。一直到五年前，我們體會到這樣不見得是件好事，因此我們開始很努力地從根本教導民主的過程。關於民主的知識並不成問



林政安/攝
柯春德博士談「公民民主教育如何落實在社會科教材中」

題，比較嚴重的缺失是民主的價值觀、民主的技巧以及政治的能力。所謂政治的能力 (political efficacy) 是指每一個個體對於其在社會群體中可以發生作用，製造差異的自覺。要教導民主的技巧、培養政治的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參與」。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參與的觀念和價值觀、技巧同時被強調的原因。我們在教科書的練習中就已經設計了活動，讓學生可以同時獲得技能、建立價值觀並且參與。首先我們直接在教科書中介紹憲法、獨立宣言等，並分析其價值觀。例如，講到言論自由時，便從新聞中尋找案例來說明，不僅僅在教科書中提出問題，也在教師手冊裡告訴老師如何教導學生將問題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希望藉著這樣的討論能讓學生了解並接受言論自由的價值。在美國，普遍認為重要的民主價值觀來自憲法，由於憲法是較一般性的文件，在細節上有很多的詮釋空間，所以價值觀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例如，許多年前，民族融合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觀，經過二十多年來的民權運動及廣泛討論，愈來愈多的人覺得以前提倡的融合觀念並不正確，取而代之的是多樣化、多元性 (diversity) 的價值觀。現在我們大力推廣的民主技巧是：一、對話的技巧，二、妥協的技巧，

三、適應的能力。爲了要有對話就一定要有自由的互動，自由的互動必須是文明的、非暴力的，否則便不可能有妥協；爲了要教導這些技巧，必須允許學生在教室裡能有自由的互動，但必須是以文明的方式；爲了要教導政治的能力，必須允許學生參與決策。我們把教室、學校當成社會的縮影，鼓勵教師們要讓學生看到在教室與學校的環境中，他們的責任在哪裡，也就是說把教室或學校當成一個社區、一個生命共同體，每一個人都盡力把這個生命共同體變得更好，等到學生年紀稍長，再帶領他們走進真正的社區，看他們怎樣幫助這個生命共同體成長。所以現在在美國教育形成一個趨勢，就是強調「服務」，學生若要申請高一級的學校如大學、研究所或獎學金，校方看的不只是成績，還要看學生服務的記錄及在服務過程中是否具備領導能力。

最後，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美國公民教育教材從學術性的教材轉向問題導向及解決問題導向的教材，但是我們在解決問題這方面走得太遠，希望臺灣不要重蹈覆轍。在反省之餘，我們試著在學術性教材、知識性教材、參與性教材間尋求平衡，在教材的整合過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便是民主的觀念與過程。

◎討論

問：如何選擇教材，以激發學生對教材之興趣進而引發學習動機？

答：教材除了提供學生閱讀外，如何去實踐更爲重要。因此我們選擇的範例都是經過仔細的考慮，有較高的實用性，而系列的議題不僅適用於特定的州，更是全國都普遍存在的，例如如何處理貧窮的問題，這是所有地區的課本都可採用的。在我的課本中有兩頁就是討論這個問題，一頁是敘述社區如何募款幫助窮人，另一頁就是一個實例並且提出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要學生發覺社區的問題，讓他們知道社區需要他們，並在教師手冊中告訴老師教學生如何研究他們的社區；第二個問題是，在社區中，誰爲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做了些什麼事情；第三個問題是，你爲社區做了什麼，學生們也會因爲這些問題而去思考；第四個問題是，你覺得你可以爲社區做些什麼，然後學生可以在老師的幫助下去討論，就會產生動機並知道如何去幫助人；像這類的問題是絕對沒有地域的限制，也是所有國家都適用的。

問：近幾年來，本土文化受到普遍地重視，因此我國也致力於發展鄉土教材；由於美國每個州政府都有它的指導原則，各州的鄉土民情又各異

其趣，請問你們如何處理鄉土教材的問題？

答：在美國，我們把鄉土文化及地區特色放在多元化的教育當中，民主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要能夠接受個別差異，所以在教材的安排時也盡量考慮到文化的差異。民主不是單一的意識形態，而是多元的。民主的過程就是辨認各式團體共同的組成要素及興趣。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試著包涵並且接納少數民族，過去少數民族在融合的過程中常被忽略，現在多元化的教育在美國還處在十字路口的階段，因為我們太強調差異性了；在民主制度中，我們首先要探討的不是差異在那裡，而是要找出共同的利益何在，建立一個生命共同體。十一月的全國社會教學學會，我們將討論多元化的教育如何超越差異性，並把重點放在社區建設。昨天到臺北縣教育局參觀，得知他們正在發展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教材，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我希望強調生命共同體的建立應凌駕於差異性的介紹。

問：如何把「愛國主義」這個觀念放入教材中？

答：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像今天這樣，是因為人民可以監督並且控制政府，是人民把尼克森總統趕出白宮，也是人民使得當年的副總統安格紐被

提起公訴並被判刑，所以所謂的愛國主義就是教導年輕人有能力提出對政府的質疑。假如我們從課本中學習到的愛國主義不是來評斷國家的好壞，而是教人民有能力去盡公民的職責，那麼我全力支持愛國主義，教育也應盡力推廣愛國的觀念。十年前你們是不允許討論這個問題的，顯然目前的情況好了很多，在座各位就是要使這個情況變得更好。

問：目前我們公民與道德科的內容不只涵蓋民主與公民教育的觀念，還包括社會科學，例如教育、社會、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等，您覺得這樣的整合如何？分科教育還是課程整合較適合學生？

答：我們在美國一直有辯論這個議題，一般認為低年級普遍有課程整合的情形，高年級分科分得較細。去年我在一篇學術論文中提出無論年級高、低，都應盡量把民主過程的觀念整合在一起。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各年級都有教導人際關係的課程，低年級則較注重個人與家庭、社區等的關係；除此之外，還有本國或世界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等，與其像從前以事件、編年史等為優先的教授方式，還不如以民主演進的過程做為一個基本的架構，例如從最早希臘發現民主的過程開始，中間歷經英國大

憲章、光榮革命、法國革命等，也許最後是臺灣政治的革新，這是我在一個社會科學期刊上發表過，但還未出版的提案。

採取中庸之道也許是最好的方式，在這裡我特別提出一種「交響樂曲式」的教學法：每一年級（樂團）有不同的科目（樂器），這當中會有一個主科（首席獨奏），每個學期有不同的組合（樂曲，例如鋼琴、小提琴協奏曲等），那麼主科就隨之不同，但內容都會涉及到社會及政府等的議題；同樣的，年級越高，獨立的科目就越多。

問：過去我國較重視機械性的課程，現在這個現象已經逐漸改變，請問如何檢視課程，在教授學生知識與問題解決方面達到平衡？

答：教學方式通常有三種，第一是輸入，也就是把知識教授給學生；第二是教學生具有組織這些知識的能力；第三是讓學生藉由管道或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即使在美國大部分的教學方式還是像在傳統的教室中以知識的輸入為主，現在我們正試著調整比例，希望能加強學生組織及表達方面的能力，使教材更為均衡。 #